

DOI: 10.19970/j.cnki.ISSN 2096-9708.2026.02.006

高句丽佛寺的发现及相关问题探讨

王飞峰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北京 100101)

摘要: 目前在中国和朝鲜境内均发现了高句丽佛寺遗址, 主要包括吉林琿春古城村1号寺庙址, 平壤清岩里土城佛寺遗址、力浦区域定陵寺遗址, 平安南道平原郡德山面元五里佛寺遗址、大同郡林原面上五里佛寺遗址, 黄海北道凤山郡土城里佛寺遗址等。高句丽佛寺布局的主要特征为以八角形佛塔为中心, 周围有佛殿、讲堂和山门等建筑, 八角形的佛塔是高句丽佛寺布局中比较有特色的一面, 同时其源流问题也是需要关注的问题。高句丽佛寺发现的大量高句丽佛像及相关遗物丰富了高句丽历史与考古研究的内涵和空间。高句丽佛寺布局及出土遗物的分期断代、国寺制度、舍利瘞埋等相关问题也是高句丽考古中重要的研究课题。

关键词: 高句丽; 佛寺; 佛塔

中图分类号: K31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9708 (2026) 02-0061-11

一、佛教传入高句丽

佛教产生于古印度, 东汉明帝时期佛教正式传入中原地区。南北朝隋唐时期佛教在中国进入大发展时期, 遍布全国的石窟寺等佛教遗迹和数量庞大的各类佛教造像见证了当时佛教在中国的繁荣。随着佛教在中国传播和发展, 佛教也进入高句丽地区并出现了佛寺建筑, 本文通过梳理高句丽地区的佛寺材料, 来探讨八角形建筑在高句丽地区的出现、八角形建筑的源流、佛寺布局及佛寺遗址发现的瓦件等相关问题。在讨论高句丽佛寺之前, 梳理高句丽佛教传入的时间是必要的。

关于佛教传入高句丽的时间, 目前学者的意见并不一致, 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第一, 根据《三国史记》的记载, 认为372年佛教由前秦僧人顺道传入高句丽。^① 第二种, 根据冬寿墓出现的莲花纹, 认为不晚于357年的4世纪中叶佛教传入高句丽地区,^[1] 甚至认为冬寿本人

可能也是佛教信徒。^[2] 第三, 根据《高僧传》中支道林(314—366年)与“高丽道人书”的记载, 认为“高丽道人”即是当时高句丽地区的佛教徒, 因此在366年之前佛教已经传入高句丽地区。^[3] 第四, 根据《高僧传》《凤岩寺智证大师寄照塔碑》关于昙始的记载等认为东晋太元二十年(395年)佛教由东晋僧人昙始传入高句丽。^[4] 第五, 根据《高僧传》《凤岩寺智证大师寄照塔碑》关于昙始的记载以及高句丽佛像资料等认为东晋太元末期二十年(约390—396年)佛教由后秦僧人昙始传入高句丽。^{[5] (P135-151)} 结合文献资料和高句丽地区发现的佛像材料等, 笔者认为第五种观点较为可信, 《三国史记》《三国遗事》和《海东高僧传》等史料在涉及佛教传入高句丽时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杜撰。佛教正式传入高句丽并得到官方认可之后, 大量与莲花纹、忍冬纹有关的器物(如瓦当、马具、装饰品等)、壁画纹样等爆

收稿日期: 2026-01-07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专项“辽宁省盖州市青石岭山城考古发掘资料整理(2015-2024)与研究”(24VGB003)、“高句丽、渤海相关考古资料普查、汇集和整理工作”(17VGB002)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王飞峰(1981—), 山西省运城人, 博士, 副研究员, 研究方向: 高句丽考古、汉唐时期中国与朝鲜半岛的文化交流。

① 魏存成:《高句丽遗迹》, 文物出版社, 2002年, 第7页; 李裕群:《高句丽佛教造像考——兼论北朝佛教造像样式对高句丽的影响》, 《4—6世纪的北中国与欧亚大陆》, 科学出版社, 2006年, 第233-246页。

炸式地出现在高句丽地区并迅速地扩展开来。冬寿墓出现的莲花纹主要见于前室西侧室藻井顶部、冬寿夫妇的坐帐四角及顶部、前室的石柱枌斗侧面，冬寿夫妇坐帐四角及顶部的莲花纹应该是与坐帐一起使用的装饰纹样；前室西侧室藻井顶部、前室的石柱枌斗侧面的莲花纹也可以看做一种装饰纹样，并不代表当时佛教正式传入高句丽地区并得到官方认可。

二、高句丽佛寺的发现

佛寺作为高句丽地区一种特殊建筑形式，是佛教在高句丽地区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目前在中国及朝鲜半岛均发现有高句丽时期的佛寺遗址，主要有吉林省珲春市古城村1号寺庙址，^{[6] (P224-225)} 朝鲜平壤市力浦区域定陵寺遗址、^① 清岩里土城佛寺遗址、^② 平安南道平原郡德山面元五里佛寺遗址、^{[7] (P63-72)} 平安南道大同郡林原面上五里佛寺遗址、^③ 黄海北道凤城郡土城里佛寺遗址^④ 共6处佛寺庙址。

珲春古城村1号寺庙址，位于吉林省珲春市三家子乡古城村东侧，地处图们江支流珲春河冲积平原，西邻唐代渤海国都城——东京八连城近4km，2016年开始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该遗址进行了持续发掘。发掘结果表明，该佛寺遗址由于农田改造破坏严重，发现遗迹包括墙体基槽4段、疑似磴墩3个、火坑遗迹1处，出土大量佛教造像、板瓦、筒瓦及瓦当等遗物。造像特征与中原地区北朝晚期至隋代造像接近，与

朝鲜半岛发现的高句丽佛像具有一定的相似性，推测是6世纪晚期高句丽佛教造像。出土瓦件中发现有与三燕瓦当特征接近的莲花纹瓦当，瓦当上有铭文“壬子年六月作”，瓦件特征大体从三燕时期到渤海中晚期。发掘者认为1号寺庙址是中国境内发现的第一处高句丽佛寺遗址，始建于5世纪，一直沿用到渤海晚期，废弃于926年契丹攻灭渤海之时。

平安南道平原郡德山面元五里佛寺遗址，位于平壤西北约24km的万德山（海拔248m）西南麓，1932年当地发现泥质佛像，由小场恒吉购入，后入藏朝鲜总督府博物馆。1937年由朝鲜古迹研究会小泉显夫等人“发掘”，该遗址主要分为两个时期，上层为高丽时代寺庙址，下层为高句丽寺庙址，下层的高句丽寺庙遗址被晚期建筑破坏严重。遗址中发现有高丽晚期青瓷碗、青铜盒、瓦件等高丽时代遗物，同时还发现了高句丽泥塑菩萨像和佛像^⑤（图1）、莲花纹瓦当、花纹砖、铭文砖（“太”“安安”）、鸱尾、陶器等高句丽时期遗物。平壤南部土城里出土陶质菩萨范，万德山北麓发现类似泥塑菩萨像。

平壤清岩里土城佛寺遗址（图2），位于平壤东北约3km、大同江右岸的清岩里土城内，1938年由朝鲜古迹研究会小泉显夫等人“发掘”，该遗址主要分为两个时期，上层为高丽时代寺庙址，下层为高句丽寺庙址。遗址中发现有高丽莲花纹瓦当、滴水等高丽时期遗物，同时还发现了高句丽莲花纹瓦当、兽面纹瓦当、兽面砖、金铜

①（朝）김일성종합대학:《동명왕릉과그부근의고구려유적》，김일성종합대학출판사，1976년。该书有日文译本，见金日成综合大学编，吕南喆、金洪圭译：《五世紀の高句麗文化》，雄山閣，1985年，本文图4采自该书第88页图89，略有修改。本文图9:1采自该书第5页图2，略有改动。

②（日）小泉顯夫:《平壤清岩里廢寺址の調査概報》，《昭和十三年度古蹟調査報告》，朝鮮古蹟研究會，1940年。本文图2采自该书圖版第一〇，略有修改。

③（日）齋藤忠:《平壤大同郡林原面上五里高句麗建築址の調査》，《考古學雜誌》，第30卷第1號，1940年，第13-17页；小泉顯夫:《高句麗の遺跡を掘る》，《朝鮮古代遺跡の遍歴 - 発掘調査三十年の回想 -》，六興出版，1986年，本文图3采自该书第347页第135图，略有修改。

④（朝）남일룡:《황해북도봉산군토성리고구려절터에대하여》，《조선고고연구》，1987년제4호。本文图5采自该书第31页图13，略有改动。

⑤ 元五里佛寺遗址出土佛像资料主要收藏于朝鲜中央历史博物馆、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首尔大学博物馆等处，图1采自（韩）국립부여박물관:《백제기술 - 흙에담다》，국립부여박물관，2022년，第137页图101，略有修改。

制品、铁器等高句丽时期遗物。中心八角形建筑基础外侧轮廓基本完整，建筑址内部础石基本不存。八角形建筑东北侧一边保留了较为完整的 5 个础石，与之相对的西北角保留有 4 个础石。八角形建筑西、南、北三边均发现踏道遗迹，东侧由于破坏严重，没有发现踏道。八角形建筑东、南、西、北四面均发现有建筑遗存，其中北侧建筑基础保存较好（东南角缺失），可以看出为长方形。其余三面建筑基础保存较差。



图 1 元五里佛寺出土泥塑菩萨像和佛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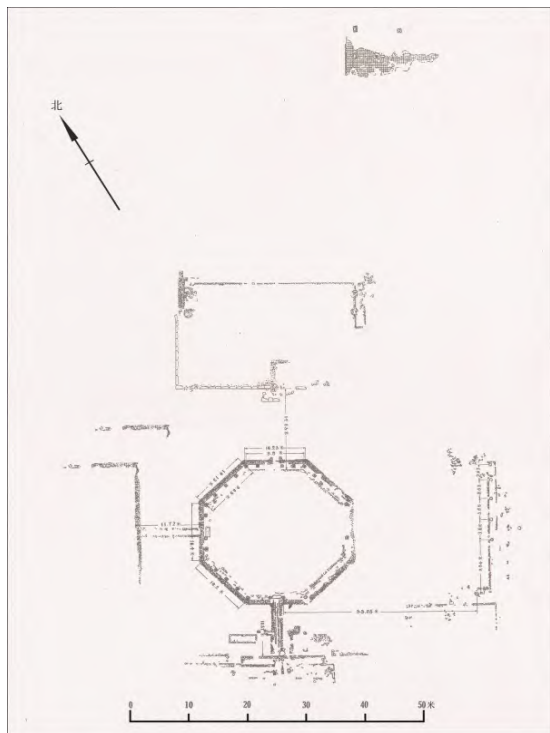


图 2 清岩里佛寺遗址平面图

平安南道大同郡林原面上五里佛寺遗址（图 3），位于清岩里寺庙址东南约 2km 的大同江北岸，1939 年由朝鲜古迹研究会“发掘”，1940 年斋藤忠简要介绍相关成果。八角形建筑每边长约 8m，八角形建筑基础内用石块砌筑方形区域，南北长约 11m、东西宽约 10m。八角形建筑址东西两侧发现用板石铺筑连接东西建筑的小路。发现高句丽莲花纹瓦当、金铜风铃及铁制挂钩（传）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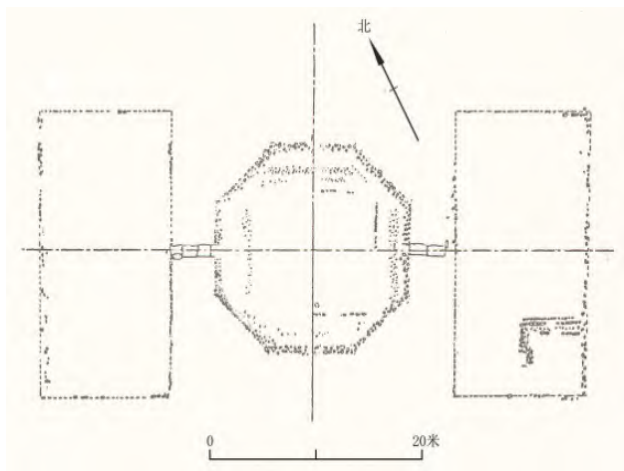


图 3 上五里佛寺遗址平面图

平壤定陵寺遗址（图 4）位于传东明王陵南约 120m，建筑遗址东西长 233m，南北宽 132.8m，是以佛塔为中心的一座佛寺，其中塔基为八角形，塔基北、东、西三面及其周围有佛殿建筑和大量与寺院相关的建筑。传东明王陵位于平壤市力浦区龙山市戊辰里王陵洞帝灵山西侧的丘陵地区，海拔约 341m，是高句丽迁都平壤后修建的一座高等级封土石室壁画墓。1975 年朝鲜金日成综合大学考古系和朝鲜科学院考古学研究所经过发掘，认为传东明王陵是高句丽迁都平壤（427 年）前后为高句丽始祖东明王重新修建的墓葬，同时在其南侧发现了一座佛寺建筑遗址——定陵寺，西北侧发现了珍珠池遗址，周围还分布有大量的高句丽墓葬。传东明王陵及定陵寺地区经过长期的发掘基本搞清了其布局，同时出土刻有“定陵□”“□陵寺”铭文的陶片，陶器、瓦当、鸱尾、鎏金铜花饰等高句丽遗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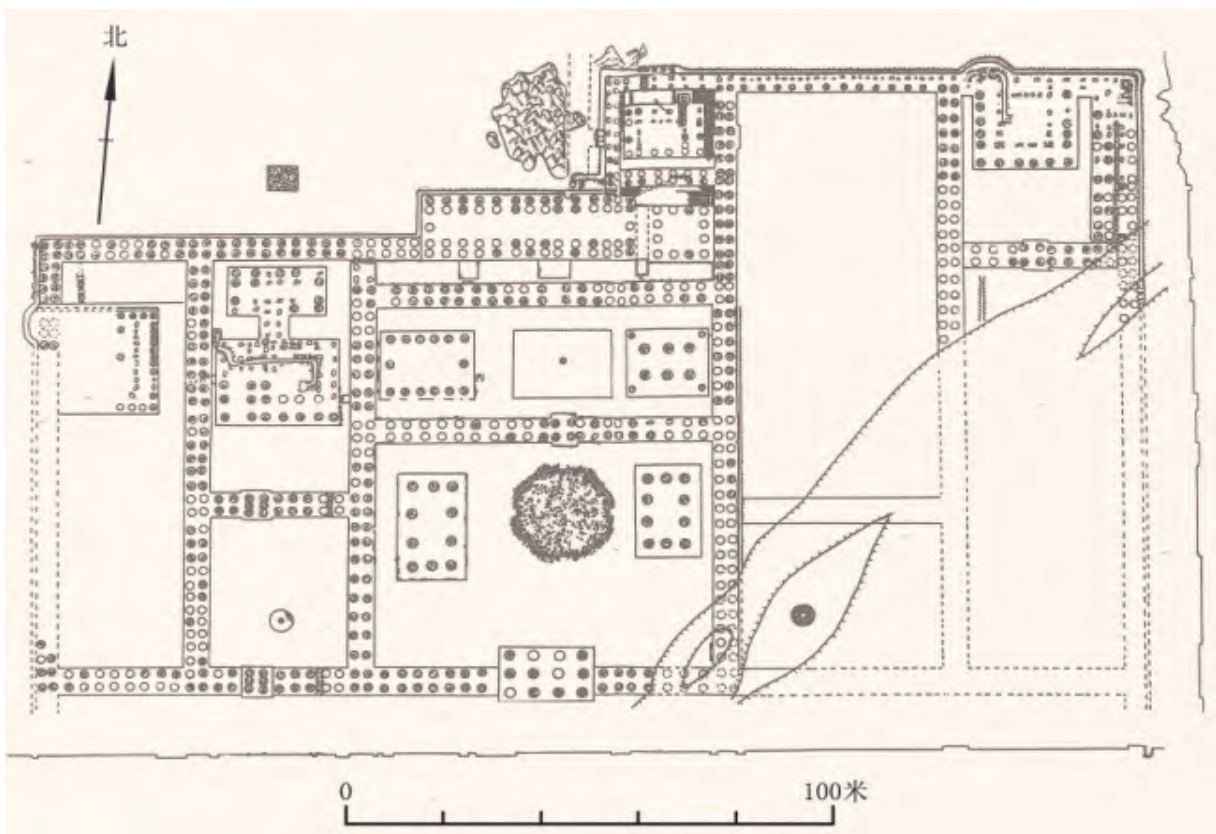


图4 定陵寺佛寺遗址平面图

黄海北道凤山郡土城里佛寺遗址（图5），位于黄海北道凤山郡土城里，1987年发掘，发掘结果表明遗址破坏严重，八角形建筑址西、北确认有建筑基址遗存，推测东侧也存在建筑遗存，发现莲花纹瓦当等遗物。

此外一些与高句丽相关的文献材料和遗物中也发现与高句丽佛寺相关的内容。根据《三国史记》的记载，好太王时期曾经在平壤创建“九寺”，^①“九寺”或者表示九座佛寺，或者表示佛寺

数量之多。之后的文咨明王时期创建了金刚寺，^②部分学者推测清岩里佛寺遗址应该是文咨明王创建的金刚寺。^{[8] (P5-19)}而在《三国遗事》中，高句丽辽东城有阿育王塔，^③推测辽东城及其附近应该有佛寺。宝藏王时期曾有普德和尚住在平壤盘龙寺。^④此外《三国遗事》中还有灵塔寺^⑤的记载。大业八年（612年）隋与高句丽战争时，隋将来护儿曾攻至平壤城下，“罗郭内空寺中”的高句丽伏兵用诈败之计击败来护儿。^⑥总章元年（668

① “广开土王，讳谈德，故国壤王之子……创九寺于平壤。”（高丽）金富轼著，孙文范等校勘：《三国史记》，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223页。

② “（文咨明王七年）秋七月，创金刚寺。”（高丽）金富轼著，孙文范等校勘：《三国史记》，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233页。

③ “辽东城阿育王塔。”（高丽）一然著，孙文范等校勘：《三国遗事》，吉林文史出版社，2013年，第119-120页。

④ “普德和尚住盘龙寺。”（高丽）一然著，孙文范等校勘：《三国遗事》，吉林文史出版社，2013年，第115页。

⑤ “高丽灵塔寺。”（高丽）一然著，孙文范等校勘：《三国遗事》，吉林文史出版社，2013年，第121页。

⑥ “右翊卫大将军来护儿帅江、淮水军，舳舻数百里，浮海先进，入自溟水，去平壤六十里，与高丽相遇，进击，大破之。护儿欲乘胜趣其城，副总管周法尚止之，请俟诸军至俱进。护儿不听，简精甲四万，直造城下。高丽伏兵于罗郭内空寺中，出兵与护儿战而伪败，护儿逐之入城，纵兵俘掠，无复部伍。伏兵发，护儿大败，仅而获免，士卒还者不过数千人。”（宋）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181《隋纪五》炀帝大业八年，中华书局，2013年，第5770-5771页。

年),唐将契苾何力引兵到平壤城下,围攻平壤后,高句丽宝藏王及泉男产等投降,但是泉男建依然据城固守,期间泉男建曾将平壤城防守委托僧人信诚,信诚与唐军联络后决定开城投降,泉男建自杀未遂被擒。^①信诚能够得到泉男建的信任,推测二人平时应该往来密切,信诚所居寺院应该在平壤城内或平壤城附近。平壤长梅里曾发现“□□寺”铭文瓦件三块,文字均刻划而成,其中一件刻在用瓦件磨成的圆瓦片凹面,另外两件刻于筒瓦的凹面^②。有学者根据残存字形推测为“□严寺”。^{[9] (P357-3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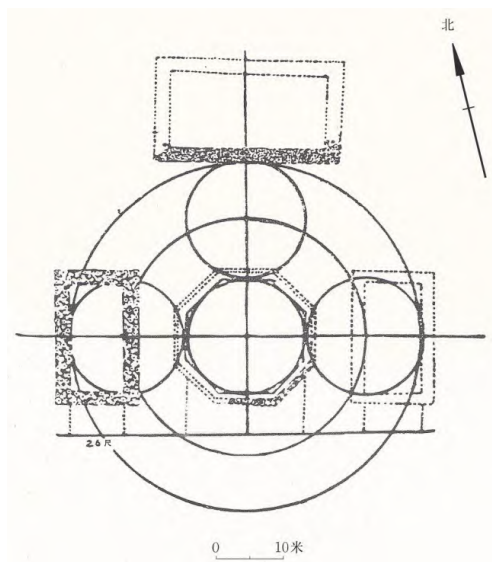


图5 凤山郡土城里佛寺遗址平面图

韩国庆尚南道宜宁郡出土的一件延嘉七年(539年)高句丽金铜如来立像背光后有“高丽国乐良东寺”的刻铭^③(图6)。朝鲜中央历史博物馆也收藏有一件铭文类似的延嘉七年金铜佛像,铭

文中也有“高丽国乐良东寺”的记载。^[10]



图6 延嘉七年金铜佛像

三、相关问题探讨

1930年代日本学者在朝鲜相继“发掘”多座高句丽佛寺,1945年之后朝鲜学者发掘了定陵寺遗址和黄海北道凤山郡土城里佛寺遗址,新世纪以来中国学者在吉林省也发现了珲春古城村1号寺庙址。自高句丽佛寺遗址发现以后,相关的研究也随之开展。

最初的研究者主要来自“发掘”者,如1938年小泉显夫“发掘”清岩里土城佛寺遗址后,结合位置和文献记载等,推测是《三国史记》记载的高句丽“金刚寺”。^{[8] (P5-19)}朝鲜学者发掘定陵寺遗址后,对其年代、结构及布局等问题也进行了相关研究。^[11]1970年代开始有

①“(总章元年九月)契苾何力先引兵至平壤城下,(李)勣军继之,围平壤月余,高丽王藏遣泉男产帅首领九十八人,持白幡诣勣降,勣以礼接之。泉男建犹闭门拒守,频遣兵出战,皆败。男建以军事委僧信诚,信诚密遣人诣勣,请为内应。后五日,信诚开门,勣纵兵登城鼓譟,焚城四月,男建自刺,不死,遂擒之。高丽悉平。”(宋)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201《唐纪十七》高宗总章元年,中华书局,2013年,第6470页。

②其中两块见朝鲜总督府:《高句丽时代之遺蹟》(圖版上册),朝鲜总督府,1929年,第70页,圖390:長梅里(褐)、圖391:長梅里(褐)。另外一块见(日)井内古文化研究室編:《朝鮮瓦磚圖譜Ⅱ高句麗》,井内古文化研究室,1975年,圖版72:273平壤府南串面長梅里蘆梅洞出土。

③1963年出土于庆尚南道宜宁郡,高16.3cm,目前收藏于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为韩国国宝119号。铭文为:延嘉七年岁在己未,高丽国乐良东寺,主敬弟子僧演师徒卅人共造,贤劫千佛流布第廿九回,现岁佛比丘法颖所供养。一般认为延嘉七年为539年,本文图6采自북천박물관, 서울대학교박물관:《고구려-한반도를품다》,북천박물관,2012年,第162-163页图127。

学者对传东明王陵及定陵寺这种陵寺结合的布局进行了探讨,并认为高句丽上述陵寺结合布局受到了北魏永固陵及思远佛寺形制的影响。^①但是也有学者从永固陵和传东明王陵的年代出发,认为传东明王陵和定陵寺的布局是否受到永固陵的陵寺布局需要进一步研究。^[12]有学者从东亚佛寺布局的视角讨论了高句丽佛寺布局及其在东亚地区的影响,以八角形佛塔为中心,周围呈“品”字形排列三座佛殿的“一塔三金堂式”布局是高句丽佛寺的基本样式,时代从5世纪一直延续到7世纪,日本的飞鸟寺、新罗重建的皇龙寺和芬皇寺均受到了高句丽佛寺布局的影响^[13]。元五里佛寺遗址出土了大量泥塑造像,有学者讨论了泥塑造像的供养方式、高句丽佛塔的建筑形制及装饰等。^{[14] (P58-70)}另外对高句丽佛寺发现佛像的年代、^{[15] (P491-510)}形制布局、^②地方寺院和平壤寺院^{[16] (P318-330)}等问题也有学者进行了相关研究。有的学者认为平壤的永明寺为高句丽寺院,^{[17] (P108)}目前该遗址并没有发现高句丽时期的遗迹和遗物,作为重要物证的石狮子应是高丽时代的遗物。

(一) 八角形建筑在高句丽地区的出现

目前发现的高句丽地区最早的八角形建筑是位于丸都山城宫殿址的2号、3号建筑址(图7)。丸都山城宫殿址的年代,考古报告认为下限是342年,毁于慕容皝攻破丸都山城的战争。^③我们通过对地层、文献和相关器物等的数量,认为是好太王时期“十七年(407年)春二月,增修宫阙”的结果,迁都平壤(427年)以后逐渐废弃。^[18]丸都山城宫殿址2号、3号建筑址的年代

与宫殿址年代基本一致。曹魏毌丘俭、前燕慕容皝(342年)毁掉的丸都山城宫殿址的寻找和确认也是今后高句丽考古的重要课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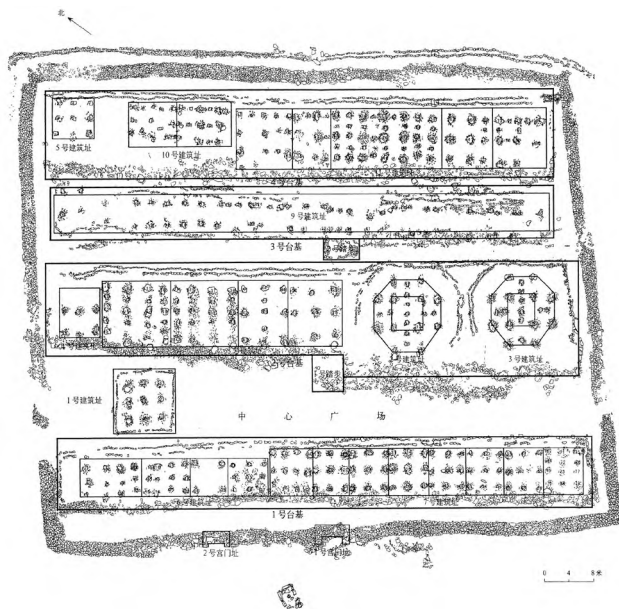


图7 丸都山城宫殿址平面图

此外从定陵寺等佛寺塔基的发掘结果来看,八角形的柱网比较密集,因此复原和研究高句丽密集柱网的建筑形制时,高层建筑可能也是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辽东城冢壁画的小城内即绘有可能为三层的建筑。丸都山城2号和3号建筑址,基础为八角形,柱网相当密集。目前在麻线一号墓、^[19]德兴壁画墓^{[20] (P61图18)}等壁画墓中发现有高句丽粮仓的图像,从图像推测粮仓为干栏式的长方形建筑。结合目前在朝鲜半岛的高句丽地区发现的八角形建筑址均为塔基等因素,笔者认为这两个建筑址可能是与佛教相关的建筑(如佛塔),由于这两个建筑址并列分布,因此也不排

① 宿白:《盛乐、平城一带的拓跋鲜卑—北魏遗迹——鲜卑遗迹辑录之二》,《文物》1977年第11期,第38-46页; (日)岡村秀典、向井佑介:《北魏方山永固陵の研究—東亞考古学会1939年收集品を中心として—》,《東方学報》第八十册,2007年,第150-69页。

② (朝)金正基:《高句麗 定陵寺址 및 土城里寺址 발굴보고개요와고찰》,《佛教美術》第10輯,東國大學校博物館,1991年,第3-31页;鄭永鎬:《三國時代の佛教建築》,《考古美術》第150輯,韓國美術史學會,1991年,第40-57页; (日)千田剛道:《高句麗寺院跡の発掘》,《仏教芸術》第207号,1993年; (日)田中俊明:《高句麗の寺院》,《高句麗の歴史と遺跡》,中央公論社,1995年,第311-330页; (日)田中俊明:《高句麗の寺院址に関する若干の考察》,《楽浪と高句麗の考古学》,同城社,2001年,第357-380页;董新林:《北魏方山永固陵初步研究》,《考古》2023年第5期,第93-105页。

③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集安市博物馆编著:《丸都山城——2001—2003年集安丸都山城调查试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4年。本文图7,采自该书第71页图四一,略有改动。

除丸都山城 2 号和 3 号建筑是两座并列佛塔的可能性。

（二）八角形建筑源流

关于八角形佛塔，有学者^[21]认为八角形佛塔起源于公元 1 世纪的犍陀罗地区，并影响到与之相邻的秣菟罗地区，由犍陀罗首先向北传播至阿富汗的哈达地区，再向东传至楼兰，由楼兰开始分别向东、向西传播，其中向东到达敦煌、酒泉、武威等。目前在河西走廊等地区发现 14 座北凉石塔，根据相关学者的研究，根据对石塔铭文的研究，其年代大体 426—436 年。^{[22] (P75)} 因此丸都山城宫殿址八角形建筑的年代可能早于北凉石塔的年代。也有学者^[23]认为东亚地区八角佛塔的建筑理念和营造尝试，源于 5 世纪初后秦的长安，直接原因是《四分律》的译出，当时高僧惠始将长安的八角塔建

筑理念带入北魏，在平城营建了八角塔，并影响了高句丽地区八角塔的出现。何利群近年来对东亚地区早期佛寺布局及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13]其中河北临漳邺南城赵彭城佛寺塔基（北齐时代）发掘中发现有多件五边形和梯形石块，亦可复原为八边形建筑的基座，由此可证当时八边形塔并非高句丽所特有。

传平壤林原面上湖里寺址曾发现铁制挂钩 5 件和 3 件残损的金铜风铃^①（图 8），挂钩包扩长柄形铁钩和铁钩上的圆环，完整的挂钩长约 28cm。金铜风铃上部均完整，下部均有残损。部分学者认为铁制挂钩、金铜风铃可能是上五里佛寺遗址出土，上湖里出土品应该是误传。^{[24] (P344)}从铁制挂钩和金铜风铃的形制来看，可能是佛塔或佛寺建筑上的风铃，为复原高句丽佛塔及建筑结构等提供了重要依据。



1. 铁制挂钩



2. 金铜风铃

图 8 传平壤上湖里佛寺遗址出土铁挂钩及金铜风铃

韩国京畿道广州郡二圣山城在发掘中，发现了八边形建筑址、九边形建筑址等建筑遗迹。二圣山城位于京畿道广州郡西部面，自 1986 年至今汉阳大学博物馆等单位已经对其进行了十余次发掘，发现了多处建筑址和大量遗物，其中 D 区发现八角形建筑址一处，E 区发现九角形建筑址和长

方形建筑址各一处，C 区发现十二角形建筑址一处、长方形建筑址两处。关于八角形建筑址和九角形建筑址的性质，发掘者认为 6 世纪末百济祭祀的社稷坛和天坛。^{[25] (P11-12)}此外韩国庆州的萝井遗址^{[26] (P31)}也发现了八角形的建筑，萝井遗址位于庆尚北道庆州市塔洞，八角形建筑址四周还有

①（日）梅原末治、藤田亮策编著：《朝鲜古文化综鑑》（第四卷），养德社，1966 年。本文图 8:1 采自该书图版第四三，第 130-134 页；本文图 8:2 采自该书图版第六〇，第 194-196 页。

围墙及附属建筑。萝卜井遗址是新罗始祖的诞生地、新罗王室和祭祀始祖的场所,^①新罗照知麻立于九年(487年)设置神宫。^②根据八角形建筑周围出土“仪凤四年(679年)皆土”铭文板瓦等遗物,八角形建筑的时代可能在新罗文武王时期(661—681年)或稍晚。日本法隆寺梦殿(建于739年)、荣山寺八角堂(建于757年)、兴福寺北圆堂(建于1208年)等均为单层八角形佛殿,^{[27](P245)}其形制为我们复原丸都山城宫殿址八角形建筑提供了参考。唐代开始中原地区出现了大量八角形建筑,其中部分为佛塔,辽金时期八角形佛塔一度盛行。

汉魏时期中原地区、辽西地区发现了大量与八角形有关的建筑构件、建筑形式,如沂南画像石墓发现的八角形石柱、^{[28](图版12)}辽阳汉魏壁画墓发现的呈八角形的叠涩藻井^{[29](P327-333)}等,而中原地区北朝之前几乎没有发现八角形建筑。朝鲜南浦市德兴里壁画墓(409年)前室天井部的壁画与甘肃酒泉市丁家闸壁画墓十分相似,有学者认为十六国北朝时期黄河河套地区与东北地区曾经存在着一条文化通道。^{[30](P267)}而纵观这一时期的中原地区目前还没有发现八角形的佛塔建筑,由此我们可以推测到达河西走廊的八角形佛塔可能经由这条文化通道直接传至高句丽的国内城地区,并且随着高句丽迁都平壤又出现在朝鲜半岛北部的高句丽地区。此外也不排除高句丽地区八角形建筑的出现,受到汉魏时期八角形建筑构件或建筑形式(如八角形石柱、墓葬的八角叠涩藻井等)影响,随着

佛教进入高句丽地区,八角形建筑成为高句丽佛塔的建筑形制并传播到朝鲜半岛南部的百济地区和新罗地区。

(三)佛寺布局

以塔为中心,“前塔后殿型”的布局一直是中国早期寺院的主要布局,并延续7世纪初的隋代。^③东晋十六国时期,是中国佛寺的发展期,以北方邺城、长安,江南建康地区为中心,出现塔、佛殿和讲堂的配置。^{[31](P287-311)}目前发现的高句丽佛寺遗址其布局以佛塔为中心,一般坐北朝南,以塔为中心,周围有佛殿、讲堂和山门等建筑,呈现单独的院落式结构。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佛寺建筑规模的扩大,以塔为中心的单院落式结构,逐渐发展成以塔为中心的多院落的格局,但是八角形佛塔仅有一座,如定陵寺遗址。目前高句丽东区发现的这些佛寺遗址根据其形制布局和出土遗物等判断其时代大体在5世纪到7世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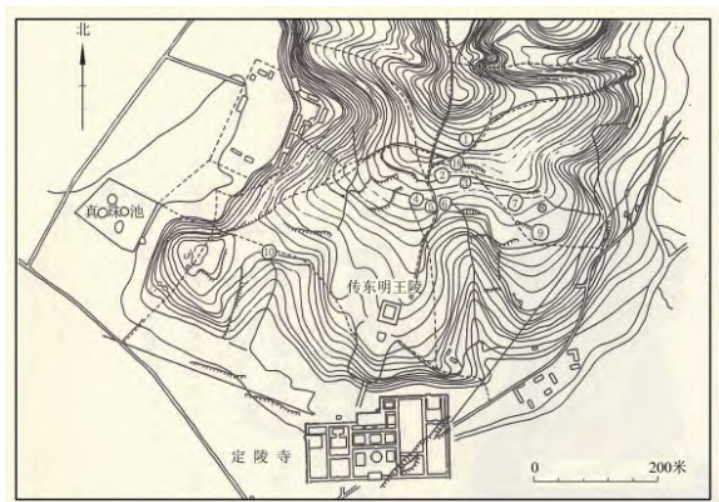
高句丽佛寺的这种结构的出现和发展应受到十六国北朝时期中原地区佛寺布局的影响。值得关注的传东明王陵南侧的定陵寺遗址,不但出土“定陵口”、“口陵寺”等铭文陶片、瓦当、陶器等典型的高句丽器物,而且这种陵寺结合的布局在山西大同北魏永固陵的形制中也可以看到^{[32](图9)}。早年有学者认为传东明王陵与定陵寺这种陵寺结合的布局受到了北魏永固陵及思远佛寺陵寺结合形制的影响。^④也有学者通过对传东明王陵及定陵寺年代的探索,认为高句丽陵寺局部是否受到了北魏永固陵陵寺形制的影响还需要做进一步探讨。^[12]

①“始祖,姓朴氏,讳赫居世。前汉孝宣帝五凤元年(前57年)甲子四月丙辰(一曰正月十五日)即位,号居西干,时年十三,国号徐那伐。先是,朝鲜遗民分居山谷之间为六村:一曰阙川杨山村,二曰突山高墟村……是为辰韩六部。高墟村长苏伐公,望杨山麓萝卜井傍林间,有马跪而嘶,则往观之,忽不见马,只有大卵。剖之,有婴儿出焉,则收而养之。及年十余岁,岐嶷然夙成。六部人以其生神异,推尊之,至是立为君焉。辰人谓瓠为朴,以初大卵如瓠,故以朴为姓。居西干,辰言王(或云呼贵人之称)。”金富轼原著,孙文范等校勘:《三国史记》卷1《始祖赫居世居西干本纪》,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1-2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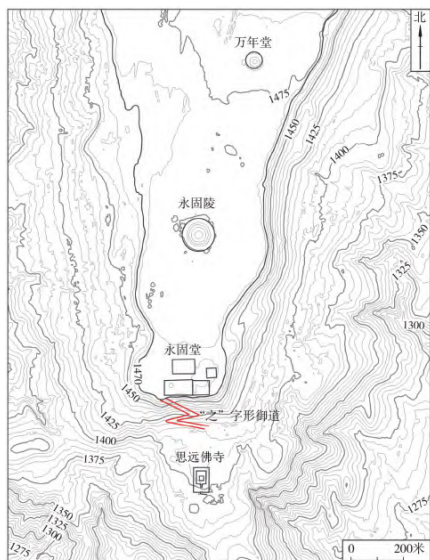
②“九年(487年)春二月,置神宫于奈乙。奈乙,始祖初生之处也。”金富轼原著,孙文范等校勘:《三国史记》卷3《照知麻里干本纪》,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第45页。

③宿白:《东汉魏晋南北朝佛寺布局初探》,《庆祝邓广铭教授九十华诞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31-49页;宿白:《隋代佛寺布局》,《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2期,第29-33页。

④宿白:《盛乐、平城一带的拓跋鲜卑—北魏遗迹——鲜卑遗迹辑录之二》,《文物》1977年第11期,第38-46页。本文图9:2采自董新林:《北魏方山永固陵初步研究》,《考古》2023年第5期,第97页图三,略有改动。



1. 传东明王陵及定陵寺遗址



2. 永固陵及思远佛寺遗址

图9 传东明王陵及永固陵布局

（四）佛寺遗址发现瓦件

关于高句丽的用瓦制度，根据文献的记载：其所居必依山谷，皆以茅草葺舍，唯佛寺、神庙及王宫、官府乃用瓦。^①目前高句丽佛寺遗址均发现瓦件，包括瓦当、板瓦、筒瓦、当沟、鸱吻等。其中清岩里佛寺遗址发现的高句丽瓦件主要有双界格线莲花纹瓦当、兽面纹瓦当、兽面砖、绳纹板瓦、方格纹板瓦等。元五里佛寺遗址发现的高句丽砖瓦材料主要有双界格线莲花纹瓦当、复合莲花纹瓦当、鸱尾，菱形纹条砖、“太”和“安安”铭文条砖等。凤山郡土城里佛寺遗址仅发现一件莲花纹瓦当。定陵寺遗址发现的高句丽瓦件主要有单界格线八瓣莲花纹瓦当、双界格线莲花纹瓦当、八瓣莲花纹瓦当、六瓣莲瓣文瓦当、莲花纹+忍冬纹复合纹瓦当、忍冬纹瓦当、兽面纹瓦当、几何纹瓦当、绳纹筒瓦、绳纹板瓦、模印“定”“寺”铭等的绳纹和方格纹板瓦、人面纹当沟、鸱尾等，此外还发现有刻划有“定陵口”“口陵寺”“众僧”“惠堪”“小玉”“弱元、归未”“𠂔”“寺”“飞”等铭文陶器，绳纹、方格纹条砖，陶砚等大量器物。其中一件印花纹长

颈瓶（韩国学者称此类器物为台附瓶）可能是与新罗有关的器物。根据韩国学者对此类器物的编年研究，其年代大体在高句丽灭亡前后。^{[33]（P83）}

从上述佛寺遗址出土的瓦件来看，莲花纹瓦当是佛寺常见的瓦当类型，兽面纹和忍冬纹瓦当有一定数量，复合莲花纹瓦当、几何纹瓦当较少。元五里佛寺遗址和定陵寺均发现鸱尾，其中定陵寺的鸱尾复原高度约1.4m、宽约1.2m，形制与安鹤宫遗址发现的鸱尾比较相似。定陵寺遗址还发现了曲背檐头筒瓦，瓦当纹样为几何纹，清岩里佛寺遗址发现了兽面砖。这些瓦件的发现一方面验证了高句丽瓦件使用、特别是佛寺使用瓦当等瓦件的文献记载，另一方面也表明了高句丽佛寺建筑屋顶的多样性。曲背檐头筒瓦、兽面砖一般适用于建筑屋顶的垂脊或戢脊前端，鸱尾用于高等级建筑正脊的两端，上述瓦件的使用可以看出有的佛寺的建筑等级较高。部分佛寺遗址如定陵寺在发掘过程中发现了大量以瓦当为主的多种瓦件，使用瓦件的类型、尺寸、纹样较多，说明建筑屋顶使用的瓦件经过多次维修。建筑屋顶瓦件的维修或替换，需要根据瓦件的受损情况

①（后晋）刘昫撰：《旧唐书》卷199上《高丽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5320页。《新唐书》的记载稍有差异，“居依山谷，以草茨屋，惟王宫、官府、佛庐以瓦。”（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220《高丽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6186页。

随时进行,更换的数量需要根据受损瓦件的情况来决定,更换的速度可能会比较频繁,使用的瓦件在类型、尺寸和纹样也会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是建筑屋顶瓦件的更换并不代表建筑本体或结构的改变。

结语

从1930年代高句丽佛寺遗址发现以后,丰富了高句丽历史与考古研究的内涵和空间。高句丽佛寺一般坐北朝南,以塔为中心、周围分布有佛殿、讲堂和山门的单独的院落式布局,这样的布局应该受到了中原地区十六国北朝佛寺布局的影响,其中八角形的佛塔是高句丽佛寺局部中比较有特色的一面,同时其源流问题也是需要关注的问题。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佛寺建筑规模的扩大,以塔为中心的单院落式结构,逐渐发展成以塔为中心的多院落的格局,但是八角形佛塔仅有

一座。高句丽佛寺发现了瓦当、板瓦、筒瓦、当沟、鸱尾等各类建筑用瓦,其中瓦当纹样包括莲花纹、兽面纹、几何纹等,一方面验证了文献记载的高句丽用瓦制度,另一方面也反映了高句丽佛寺建筑屋顶的多样性和瓦件更换的及时性。有的高句丽佛寺遗址(如元五里佛寺遗址)发现了大量佛教塑像,主要包括佛像和菩萨像,部分金铜佛像的铭文表明来源于高句丽佛寺。平壤土城里遗址发现的陶质佛像范,表明高句丽地区可以利用陶范来制造佛像。

此外根据文献记载,高句丽在隋文帝仁寿元年(601年)曾经与百济、新罗一起迎奉隋王朝赏赐的舍利并起塔供养,^①但是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与高句丽供奉舍利相关的遗迹和遗物,因此与高句丽佛寺有关的分期断代、国寺制度和舍利瘞埋等相关问题也是高句丽考古中需要持续关注的重要研究课题。

①“(仁寿元年)高丽、百济、新罗三国使者将还,各请一舍利与本国起塔供养。诏并许之。”唐释道世撰,周叔迦、苏晋仁校注:《法苑珠林》卷40《庆舍利感应表并答》,中华书局,2003年,第1281页。

参考文献:

- [1] 梁志龙.高句丽儒释道三教杂论[J].北方文物,2004(02):88-94.
- [2] 吴焯.从相邻国的政治关系看佛教在朝鲜半岛的初传[J].中国史研究,2006(01):69-80.
- [3] 温玉成.集安长川一号壁画墓[J].北方文物,2001(01):32-38.
- [4] (日)木村宣彰著,姚义田译.昙始与高句丽佛教[J].博物馆研究,2002(02):38-44.
- [5] 王飞峰.冬寿墓莲花纹研究[A].边疆考古研究(第12辑)[C].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
- [6] 解峰.吉林琿春古城村寺庙址[A].中国考古学年鉴2023[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4.
- [7] (日)小泉顯夫.泥佛出土地元五里廢寺址の調査[A].昭和十二年度古蹟調査報告[C].朝鮮古蹟研究會,1938.
- [8] (日)小泉顯夫.平壤清岩里廢寺址の調査概報[A].昭和十三年度古蹟調査報告[C].朝鮮古蹟研究會,1940.
- [9] (日)田中俊明.高句麗の寺院址に関する若干の考察[A].楽浪と高句麗の考古学[C].同城社,2001.
- [10] (韩)정경희.조선중앙역사박물관[M].예백,2008년.
- [11] (朝)김일성종합대학.동명왕릉과 그 부근의 고구려유적[M].김일성종합대학출판사,1976년.
- [12] 王飞峰.关于永固陵的几个问题[J].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2(11):19-30.
- [13] 何利群.东亚地区早期佛教寺院布局及演变[J].考古学报,2023(02):191-214.
- [14] (韩)文明大.元五里寺址塑佛像의 研究-高句麗千佛像造成과 관련하여-[A].考古美術第150輯[C].汉城:韓國美術史學會,1991.
- [15] (日)關野貞.朝鮮三國時代の彫刻[A].朝鮮の建築と芸術[C].东京:岩波書店,1941.
- [16] (日)佐藤興治.高句麗の寺院[A].古代日本と朝鮮の都城[C].东京:ミネルヴァ書房,2007.
- [17] (韩)金正基.古代寺院[A].韓國の考古学[C].东京:講談社,1989.
- [18] 王飞峰.九都山城宫殿址研究[J].考古,2014(04):93-104.
- [19] 吉林省博物馆辑安考古队.吉林辑安麻线沟一号壁画墓[J].考古,1964(10):520-528.
- [20]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社会科学院,朝鲜画报社,德興里高句麗壁画古墳[M].东京:講談社,1986.
- [21] 陈晓露.从八面体佛塔看犍陀罗艺术之东传[J].西域研究,2006(04):63-72.

- [22] 殷光明. 北凉石塔研究[M]. 台北: 觉风佛教艺术基金会, 2000.
- [23] 魏祝挺. 5-8 世纪东亚八角塔的起源及其发展[J]. 云冈研究, 2021(04): 47-58.
- [24] (日) 小泉顯夫. 朝鮮古代遺跡の遍歴[M]. 六興出版, 1986.
- [25] (韩) 김병모, 심과주. 二聖山城 第 2 次調査發掘報告書[M]. 한양대학교박물관, 1987 年.
- [26] (韩) 중앙문화재연구원. 慶州 茆井[M]. 중앙문화재연구원, 2008 年.
- [27] 孙大章. 中国佛教建筑的佛塔[A]. 中国佛教建筑[C].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7.
- [28] 南京博物院, 山东省文物管理处. 沂南古画像石墓发掘报告[M]. 北京: 文化部文物出版局, 1956.
- [29] 冯永谦. 辽阳汉魏壁画墓[M]. 沈阳: 辽海出版社, 2020.
- [30] 郑岩. 魏晋南北朝壁画墓研究[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2.
- [31] 李裕群. 隋唐以前中国佛教寺院的空间布局及其演变[A]. 边疆民族考古与民族考古学集刊(第一集)[C].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9.
- [32] 大同市博物馆. 大同北魏方山思远佛寺遗址发掘简报[J]. 文物, 2007(04): 4-26.
- [33] (韩) 홍보식. 後期樣式土器의分類와 編年[A]. 新羅後期古墳文化研究[C]. 춘추각, 2003 年.

(责任编辑 张月琴)

The Discovery of the Goguryo Buddhist Temples and Related Issues

WANG Fei-feng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Abstract: Goguryo buddhist temple sites discovered in both China and North Korea mainly include the No. 1 temple Site of Guicheng Village, Hunchun, Jilin, Pyongyang Cheongam-ri Earth Fortress buddhist temple ruins, Pyongyang Ripu Area Dingling Temple Ruins, Site of the Buddhist Temple in Won-o-ri, Deoksan-myeon, Pyeongnyang-gun, Pyongan-namdo, Site of Wuli Temple in Limwon-myeon, Dae-tong-gun, Pyongan-namdo, Hwanghae-bukto Pungsan-gun Toseong-ri Buddhist Temple Ruins, etc. The main characteristic of the layout of Goguryo buddhist temples is centered on an octagonal pagoda, and around there are buddhist halls, lecture halls, and mountain gates among the surrounding buildings. The octagonal pagoda is a distinctive feature of the layout of Goguryo buddhist temples,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 issue of its origin is also a matter of concern. A lot of Goguryo buddhist statues and related relics discovered at the Goguryo buddhist temple enriched the content and scope of research on Goguryo history and archaeology. Periodization and dating of the layout and excavated artifacts of Goguryo buddhist temples, national temple system, issues related to the burial of sarira are also important research topics in Goguryo archaeology.

Keywords: Goguryo; Buddhist temple; pagoda